

杨建军——编著

SHEHUIKEXUE  
XUESHU  
QIKAN  
BIANJI  
SANLUN

社会科学学术期刊  
编辑  
三  
论

审稿论  
文字性修改论  
冗字论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 杨建军

1965年生于甘肃省白银市。1986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后，一直在西北民族大学从事学术期刊编辑工作，并研究古代神话与古籍《山海经》。



微店



淘宝书店

责任编辑  
李媛媛 丁丽萍

封面设计



舞文·弄墨 / 晨皓

BOOK DESIGN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社会科学学术期刊  
编辑  
二  
论

杨建军  
编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编辑三论 / 杨建军等著. — 银川:  
阳光出版社, 2021.6  
ISBN 978-7-5525-5921-7

I. ①社… II. ①杨… III. ①社会科学-学术期刊-  
期刊编辑-研究 IV. ①G23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104868号

## 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编辑三论

杨建军 编著

责任编辑 李媛媛 丁丽萍  
封面设计 晨 皓  
责任印制 岳建宁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薛文斌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gchbs.com>  
网上书店 <http://shop129132959.taobao.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chubanshe@163.com  
邮购电话 0951-501413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凤鸣彩印广告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20900

开 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21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21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5-5921-7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录

## 审稿论

第一节 观点错误的稿件的识别 / 003

第二节 编辑的择稿之道 / 014

## 文字性修改论

第一节 稿件文字性修改中编辑与作者的沟通 / 021

第二节 稿件文字性修改的失误及其避免 / 041

第三节 稿件用词不当的修改例说 / 052

第四节 一些常见的文字问题 / 070

## 冗字论

第一节 冗字的大量存在 / 099

第二节 常见的冗字 / 118





## 第一节 观点错误的稿件的识别

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编辑审阅稿件，首先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准绳。有了这个认识，编辑就可以在审稿时先把不符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就是政治导向和思想认识有问题的稿件排除，然后对政治导向和思想认识没有问题的稿件作学术观点识别，并从这些稿件中选择可以刊用者。

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求得新的正确的知识。学术稿件的观点不但要新，更要真，只新不真，是没有任何学术价值的。观点求新并不难，但同时求真就不容易了，新观点并不一定就是正确的。著名《楚辞》专家汤炳正先生也论述过这个问题：

学术上的求“新”，并不是目的；求“新”的目的，在于求“真”。所谓“真”，首先是指符合或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如果不以求“真”为目的，则不管结论如何新奇，也只是空中楼阁，对学术的发展并无好处。在

中国学术史上，不乏里程碑式的论著，如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等学术大师的某些观点，固然是以“新”见称，但更重要的是在于它的“真”。而学术史上那些只“新”不“真”的学说，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如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在推动他的“维新”运动方面，也许起了一定作用。但“新”则“新”矣，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故盛行了一时之后，终于消歇。又如何天行的《楚辞作于汉代考》，“新”则“新”矣，却并不“真”，其不为人们所接受也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些论著新奇有余，而严肃不足。<sup>①</sup>

汤先生的话，是讲给从事学术研究者的，学术期刊的编辑也能从他的话中得到警示：审阅学术稿件，不能被其观点的新颖性所迷惑，放松对其观点正确性的考查；选择发表的稿件，要基于其观点的正确性，而不是其观点的新颖性。既然编辑在择用稿件时要基于其观点的正确性，那么，在审稿中，要首先把观点错误的稿件剔除。

编辑识别观点错误的稿件是有道可循的：了解导致观点错误的因素，然后在审稿时怀着疑心仔细考查其中有没有致误因素存在，只要有一项致误因素存在，观点就是错误的。下面，我将谈谈导致学术稿件观点错误的种种因素。

---

<sup>①</sup>汤炳正：《剑南忆旧——汤炳正自述》，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第168-169页。

## 一、研究方法错误

任何一项学术研究都必须采用一定的研究方法，而且方法必须正确。方法正确是获得正确认识的前提，方法错误必然导致认识的错误。在汉语研究中，对汉语同源词作全面研究的第一人是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章炳麟，他这方面的专著是《文始》。语言学家王力评论《文始》说：“其中错误的东西比正确的东西多得多。”错误的东西产生于错误的方法。章氏把《说文解字》中的独体字认作词源，单纯地在独体字中找词源，而实际上，同源词是语言问题不是文字问题，词源既可以表现在独体字中，也可以表现在合体字中。就因为章氏单纯地在独体字中找词源，结果产生大量牵强附会的观点。<sup>①</sup>有一位先生研究古代诗歌选本，用统计学的方法考查各种选本选的诗歌。其实运用此方法得不出可信的结论，因为“同样选这首诗，各有各的义法，各自有其系统，是从不同角度去肯定的。就像诗话里都赞扬一个诗人或一首诗，其实用意是有区别的”<sup>②</sup>。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要通过研读古书探究古人的思想。正确的方法是先弄懂古书的语言，看古人到底说了些什么，再通过他说的话领悟其思想，这正如梁启超所说：“想了解一家学说，最少也要把他书中语句所含意先看得明白。”<sup>③</sup>

---

①王力：《王力论学新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②程千帆：《桑榆忆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160页。

③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商务印书馆，1999，第59页。

如果反过来，先主观地认为古人应该说什么，应该有什么思想，就会想尽各种办法把古书的语言往这种思想上解释。这种错误的方法，会曲解古人的语言，得出牵强附会的观点。有些人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中偏偏采用这种错误的方法，例如，“现在研究老子的人，如果他认为老子是唯物主义的，他所注释的《老子》就变成了一个唯物主义的老子；如果他认为老子是唯心主义的，他所注释的《老子》就变成了唯心主义的老子”<sup>①</sup>。

## 二、逻辑错误

错误的逻辑会导致错误的观点。马克思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一文中驳斥韦斯特的错误观点，就首先指出了韦斯特在逻辑上的错误。在古代汉语语音研究中，清代学者钱大昕提出并论证了“古无轻唇音”的观点，这是古汉语语音学上的一个重要发现。今人有人写了一篇《古无重唇音》的文章，证明古代没有重唇音，为此搜集了二百多个例子，证据似乎很充分。但是，他举出的例子是谐声偏旁和异文的例子，这些例子只能证明上古时代重唇音和轻唇音不分，不能证明那个时代没有重唇音。他推理的大前提——凡是古书中轻重唇混用的字都是轻唇音——是错误的，结论自然错误。他把稿子投给《中国语文》杂志，编辑部审阅后退了回去。<sup>②</sup>黄帝是否如传说那样真实存在是有疑问的。1973年，在

<sup>①</sup>王力：《谈谈学习古代汉语》，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第75页。

<sup>②</sup>王力：《王力论学新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发现《黄帝四经》一书，有人根据这本书，得出黄帝真有其人的结论：“《黄帝四经》不是伪书，它成书于战国时期，是几千年来出土的轩辕黄帝第一本书，也可以说是一本治国之本的书。那么，轩辕黄帝理所当然再不会被历史学家认为是传说时代的传说人物了，而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在得出结论的过程中，有明显的逻辑问题：既然《黄帝四经》成书于战国时期而不是远古时代，怎么能说它是远古时代的黄帝的作品呢？难道远古时代的黄帝穿越时空，跑到战国时期著书？《黄帝四经》并不是黄帝的作品，而是托名于黄帝，它与黄帝没有任何关系。先把此书当作黄帝的作品，再据此推测黄帝真有其人，是完全错误的。<sup>①</sup>史学研究者把某些不见于记载的事物等同于未曾存在的事物，这同样犯了逻辑错误。郭沫若先生因甲骨文中没有“易”字，认为《周易》不会产生于商周之际。实际上，当今出土的甲骨文并不是甲骨文的全部，即便是全部，也肯定不会涉及当时的所有事物。有人因为屈原的名字与事迹在汉代典籍中才出现，于是认为先秦无屈原其人。实际上，现存的先秦典籍只是当时典籍中极少部分，即便是全部，也不可能将当时的事物囊括无遗。“如果以先秦典籍有无其人其事为依据，来判断先秦时代实有此人此事与否，则《史记》里刊载的先秦人物，就要否定一大半，不仅是屈原一人。”<sup>②</sup>

---

<sup>①</sup>黄永年：《学苑零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sup>②</sup>汤炳正：《渊研楼屈学存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47页。

### 三、赖以立论的资料不可靠

只有基于可靠资料才能得出可靠结论，而常有不可靠的资料。

我国的战国、秦汉时期、晋时都分别出现过一批伪书，明代宋濂的《诸子辨》、胡应麟的《四部证讹》考辨出多种伪书，清代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又作了一些补充，近人张心澂的《伪书通考》则是历代辨伪成果的汇编。不了解伪书而引用其中的资料作为立论的依据，结论是不可信的。

真书中也有不可靠的资料。如《史记》之《伍子胥列传》所载伍子胥鞭楚平王尸一事不可信，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六《子胥鞭平王之尸辨》一文辨析过。元人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一书对一些诗人行迹的叙述有误，今人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纠正此书的史实错误。一些研究者曾以《唐才子传》中的错误史实作为立论的依据。<sup>①</sup>近人丁传靖编的《宋人轶事汇编》，在引用资料时有些地方删减了，有些地方改动了，因而它里面的资料不尽可靠。有些关于宋代的博士论文引用此书，结论全错了。<sup>②</sup>

---

①傅璇琮：《书林漫笔》，北方文艺出版社，2008。

②郑骞：《永嘉室杂文》，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 四、研究者对赖以立论的资料理解错误

错误地理解赖以立论的资料,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楚辞·离骚》中有“帝高阳之苗裔”一句,有人把“苗裔”误解为苗族后代,从而得出楚人系苗族后代的错误结论。<sup>①</sup>宋人的诗文中常出现“西北”一词,如刘克庄《玉楼春·戏呈林节推乡兄》中的“男儿西北有神州”,辛弃疾《稼轩新居上梁文》中的“稼轩居士,生长西北,仕宦东南”。宋人所谓的“西北”,不是西北角,而是西边和北边,西边是陕西、甘肃一带,北边是山东、山西及河南的北部。在宋史研究中,很多人把宋朝的“西北”当成现在的西北。有人根据辛弃疾文中的那句话说辛弃疾生长于陕西,其实他生长于山东,至于陕西,去也没去过。南宋人说的“京都”或“京师”,指开封府,是已经丢掉的那个老京都,而不指杭州或临安。他们把杭州或临安说成“行在”或“行都”,绝不说成“京都”或“京师”。曾经有些论文把南宋人说的“京都”“京师”理解错了,从而把好多属于开封的事说成了杭州的事。<sup>②</sup>

#### 五、赖以立论的资料片面

在研究工作中,搜集的资料越全面,得出的结论越可靠;资

<sup>①</sup>汤炳正:《渊研楼屈学存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20页。

<sup>②</sup>郑骞:《永嘉室杂文》,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料越片面,得出的结论越片面甚至错误。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资料主要来自田野调查。研究者深入城市社区、乡村庄户、各行各业,零距离接触各地方、各民族、各阶层、各职业的群众,在对他们的访谈中收获鲜活、生动、丰富的田野资料,然后整理、分析这些资料,形成观点。每一次访谈过程都包含一串故事,都有让调查者津津乐道而又不易道完的丰富、生动甚至曲折的细节。如果研究者的田野调查只走了访谈形式,只是匆忙仓促,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粗枝大叶,那么,他们从田野中草草拿来、用于拼凑文章的资料就是不全面、不完整、不系统的,甚至是不准确的。根据这样的资料提出的观点自然是偏颇的甚至错误的。如果没有其他人重新调查,他们的观点就会让人信以为真,从而贻误学术界。历史学家陈垣把全面搜集关于一个问题所有资料称为“竭泽而渔”。而研究问题时“竭泽而渔”是不易做到的,就像清代学者张澍所说的:“网罟或失鱼。”在这种情况下,补充观点或与观点不符的资料最终没有被研究者看到,观点的片面或错误研究者本人根本意识不到,正如历史学家杜维运所说:

纵使搜集到一千条证据以得一项结论,可能另外有一千条证据未被发现,而它们正好否定或修订该项结论,就是有一条例外,该项结论也失去了普遍性,它只能作你所搜集到的一千条证据的解释或说明,不能普遍推广。<sup>①</sup>

<sup>①</sup>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57页。

季羨林介绍过他的体会，很有代表性：

我生平有多次经验，或者毋宁说是教训，我对一个问题作出了结论，甚至颇沾沾自喜，认为是不刊之论。然而多半是出于偶然的机，又发现了新资料，证明我原来的结论是不全面的，或者甚至是错误的。<sup>①</sup>

资料片面还可以由另一种情况造成，就是研究者治学目的不纯，治学态度不严肃，无意全面搜集资料，只凭片面资料立论。在学术研究中，由较少或很少的资料触发问题，研究者提出一个假说，然后在此问题和假说的引领下增搜资料，证明假说或把假说修正成另一说的情况很普遍。但是，有的研究者在有假说之后，就偏爱上假说，不希望假说有问题，或者懒于修正有误的假说，就有意只搜罗符合假说的资料，而忽略甚至排斥不符合假说的资料。在最终写出的作品中，照样有观点、有资料，观点依托着资料，资料证明着观点，观点貌似不误。历史学家严耕望把这种做法称为“抽样作证”。<sup>②</sup>史学家金毓黻《静晤室日记》也认为：“近来作家往往胸中先持一成见，曲引古籍以证成其说，合则引用不惮其烦，不合则避而不谈，违史家实事求是之旨，吾所不取。”<sup>③</sup>

---

①季羨林：《学海泛槎》，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第303页。

②严耕望：《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31页。

③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1993，第717页。